

和平發展觀察

2015 年第 6 期（总第 6 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

2015 年 10 月 28 日

部分专家在 TPP 研讨会上的发言摘编

2015 年 10 月 27 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举办“TPP：中美经贸规则竞争与全球治理”研讨会。来自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外交部等部门研究机构的专家参加会议。现将部分专家发言摘编如下：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毕吉耀指出，首先需要了解 TPP 的客观背景。第一，在金融危机之后，面对国内经济复苏需求，奥巴马提出“五年出口倍增计划”。而亚太市场作为全世界最具活力的市场，必然是美国发展的重心。第二，对于传统 FTA，由于其环境标准、国有企业管控的方面没有相关明确约束，在美

国国内国会通过有很大政治压力，所以提出了 TPP 这个“21 世纪 FTA”。

对于 TPP 实质要有两方面基本认识。第一，TPP 发展的规则和方向与中国长远发展、改革的目标、路径是一致的，代表了经济前进发展的方向。在全球化分工细化之时，TPP 所设立的规则受到全球企业的广泛欢迎，因为可以降低关税，减少交易成本，提供更加公平的环境等等。第二，TPP 虽然在设立之初立意为“高标准、广覆盖、面向 21 世纪的新兴 FTA”，但实际上 TPP 谈判**聚焦点并非在新兴议题上，而是在传统敏感产品的关税降低和市场开放上**。谈判从某种程度上讲与 FTA 并无区别，只是标准拔高。

TPP 谈判过程复杂，所涉经济体复杂。从目前情况来看，TPP 协议的顺利达成，**美国政府做出了适当让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美国对于国内利益本身做出了让步；二是美国适当降低了 TPP 的标准。例如，对于敏感农产品有关税配额，分期分批降税。事实上，对于环保、国有企业、资产保护等条款可执行情况较差。

据此可以得出**结论**：第一，TPP 只是另一种版本的 FTA，只是比现有 FTA 标准高而已（尤其在货物贸易方面），但并非遥不可及，所以**不足为惧**；第二，未来经济一体化是发展趋势，产业政策、规则一致性要求是趋势，而共同规则是不可或缺的因素，所以一定要**高度重视 TPP 带来的规则上的变化**。

TPP 给区内区外带来不同的影响：**区外产生贸易转移效应；区内产生贸易创造效应**。短期看，TPP 在经贸投资领域对中国影

响有限。例如加工贸易会转向越南，马来西亚等，但中国人力成本的上升以及人民币的升值已经使中国加工贸易受到影响。中长期看，TPP 会带来根本性影响。虽然中国加入之后影响可能会缩减，但是亚太地区国家加入增多之后，该地区的产业链布局会有结构性变化。至于规则影响方面，美国不会放弃对国际规则的主导权。

从美方角度，是希望中国加入的，但加入时间节点有明确规定。规则制定初期，美方不会希望中国加入搅局，主导规则制定；后期规则制定完成之后，希望中国加入并遵守前期制定规则，因为如果没有中国参加的 TPP 影响非常有限。

十八大之后，中国加入 TPP 有三个结构性的矛盾。第一是国有企业问题。如今国有企业发展方向与 TPP 要求相去甚远，与美方理念有根本性冲突；第二是网络信息安全问题。企业、跨国公司对互联网畅通性要求高，但中国网络安全管控程度难以把握，会对企业发展有一定影响。第三是工会问题。TPP 对劳工权益的保护，必然带来独立工会问题，这与中国政治制度有所冲突。之前提及环保和政府采购等方面阻力很小，但以上三点存在经济、政治制度的结构性矛盾，调和余地较小，但是仍然有操作空间。

总之，既要对中国加入 TPP 有紧迫感，又要沉着冷静、步履稳健地向前发展，例如依托一带一路推动双边和小区域的贸易投资协定的签署，分散 TPP 带来的压力。使中国可以坦然应对 TPP 的发展，专注于自身的发展建设。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姜跃春提出，首先要正确看待 TPP 协议的达成。从近期看，对中国影响有限。虽然协议达成，但正式启动也需要很长时间。里面的高标准条款实施起来也并非易事，例如美日谈判让步中有的条款，都是 15-20 年之后的事情，这期间世界经贸发展带来的变化难以预测。

TPP 带来了**三方面的挑战**：第一，在经济方面，**产业链重构**的趋势要有所预测；第二，**规则重构**的进程正在发生。尤其需要关注长期性的、根本性的、对我们影响深远的规则改变；第三，美方推动 TPP 不仅有经济考量，更有**政治考量**。日本与美国有制约中国崛起的战略考虑，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利益捆绑主要是出于此。并且日本借用美国“重返亚太”战略一举两得，既遏制了中国，又与美国形成了利益共同体。

然而应该看到，TPP 规则是世界经济规则发展的趋势。其中三分之二的规则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中国应该坦然接受。除了结构性冲突的规则难以调和之外，其他方面要根据实际情况做出适当调整。

中国应对 TPP 有三点。第一，**国内企业要修炼内功**，对于**经济改革要参照 TPP 规则**。TPP 带来的不仅是危机，更是机遇，应当将其转化为倒逼国内改革的动力。第二，**要有总体全面的设计来应对 TPP，即是构建全球 FTA 网络**。全球层面，支持 WTO 等多边框架，地区层面，支持亚太自贸区等理念，在双边层面，全方位、积极与各国开展 FTA 谈判，签订 FTA 协定。第三，**专注于自**

身发展。例如一带一路战略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给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带来了积极影响，所以需要扎实进行，避免重大失误。

财政部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副主任周强武指出此次谈判能够成功，得益于四个核心问题的解决：第一是知识产权问题。其中聚焦点在药品问题，即新开发药品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美国要求对新药知识产权保护时间达 12 年，但实际最终谈判结果是 8 年。说明为达成协定，美国人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做出了一定的让步和妥协。第二是市场准入问题。日美都做出了一定的让步。日本同意对美、澳大米进口无关税配额，在 TPP 生效第 13 年要达到 17.84 万吨，小麦关税在第 9 年削减 45%，猪肉关税也下降，并在第 10 年彻底取消。美国同意进口日本整车的关税分 25 年逐步取消。第三是国有企业问题。越南和马来西亚这两个国家，自始至终跟美方坚持要求。在最终的协议文本当中，加入不少例外条款，美国做出了一些让步。第四个是投资争端解决机制（ISDS）问题。TPP 仍使用 WTO 原有的 ISDS 机制，而 TTIP 引入“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这跟欧洲长期的坚持有关。

为应对 TPP 的影响，中国正在宏观层面上，在全球层面和区域层面构建对我有利的治理结构。从上一届政府开始，直到本届政府，我们都在一直推动构建新型国际治理结构体系，领导人也高度重视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目前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是本届政府的“一带一路”在全球得到积极的回应。虽然面临一些消极的声音，但是从推动的效果看还是不错的。“一带

一路”可以将对外战略、对外布局、对外援助、沿线经贸协议都涵盖在内。

二是亚投行建立。人大近期也在审议亚投行协定，可以说，亚投行的建立已经对全球治理体系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亚投行的建立也对当前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产生了倒逼作用，根据金立群测算，5年后亚投行的年贷款规模将达到1000亿美元，将远远超过世行的400亿美元规模。而这些对我们在人才培养、规则制定等问题和领域上产生重大的利好。从亚投行协定中可以看出，以英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经济体为了参与亚投行，其在国内经历了艰苦的斗争和博弈。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都是其财长极力争取，最终通过的。金立群表示，重大发达经济体的加入，使得亚投行在成员结构上与世行等没有差别，完全可以获得3A评级。发达国家的加入不仅带来先进的治理结构、管理经验、人才，也有助于降低融资成本，有助于亚投行的可支持发展。亚投行建成后，如果顺利，将会进一步扩大规模，今年底或明年初将会接纳新一批20多个新成员国家加入。届时，亚投行将成为涵盖80个国家的经济组织，其影响力将是巨大的。

另一个会对全球治理和经济秩序产生重大影响的是“10+3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该组织于2011年4月成立。目前，有来自中日韩及东盟10国和地区的约40名经济学家负责审查财务状况。AMRO第一任领导人是来自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的魏本华。自2012年5月起，日本财务省出身的根本洋一接任该职)。

全国人大 9 月份已经审议了 AMRO 的相关文件，今年年内将会成为一个国际组织，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职能完全一样，它将成为“亚洲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AMRO 将拥有 2400 亿美元储备，应对 10+3 成员内可能出现的金融危机、动荡，AMRO 还会每年跟各成员国进行磋商，进行宏观金融监管，因此 AMRO 对强化亚太的金融稳定大有裨益。

在未来，AIIB 以及 AMRO 将会成为中国影响全球经济秩序和全球治理的重要组织。而在 WB、IMF、亚开行内，我们都是第二大股东，这些大幅度提升中国影响未来全球以及区域层面治理体系的能力。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戴长征指出，美国的地位正是在制定规则、利用规则的基础上建立的，直到今天，国际治理体系以及国际秩序仍然掌握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国手中。正如奥巴马所言，美国绝不会放弃对规则的制定权。所以 TPP 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规则制定权的问题。

美国在当前格局下，很难离开中国。中国经济自主性很好，并且拥有巨大的市场和经济体量，美国无法将中国排除在外，也不能用 TPP 围堵遏制。美国推动 TPP，首要目的还是经济，遏制中国是其副产品。

短期内，中国很难加入。就国企问题而言，中国政府很难完全按照 TPP 的要求去改变。当前，我国政府的首要任务是保持社会稳定，而 TPP 涉及到的环保、知识产权、劳工等问题等势必会

让位于政权稳定。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原所长陈凤英提出，第一，对于 TPP 起源，不主要是美国要边缘化中国，部分是“因我而起”。首先，金融危机使美国感到不知所措，2008 年加入“P4”，应对金融危机，2011 年着手进行谈判，借以完成本国经济复苏；其次，全球格局在金融危机后大变化，全球发展东移，中美力量调整，美为维持在亚太地区领导地位，希拉里提出“重返亚太”，美国要引领未来世界经济的发展，美国要主导新格局下的世界秩序规则制定。

第二，虽然 TPP 与中国有不统一之处，但与整体发展方向一致。TPP 在中国面临挑战有两方面，一是国家政治制度不统一，二是国家治理不统一。但是在中国整体发展上，TPP 与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改革开放上又相吻合。在现实布局中，无论是 FTAAP，还是 RECP，以及 BIT 等，都是中国在积极倡导、参与建设的双边、多边自贸协定。中国制度和国际体系能否有说服力，在日后经济贸易发展中，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是关键。

以上发言仅代表嘉宾观点，不代表本所立场。

和平发展研究所

2015 年 10 月 28 日

（责任编辑：陈俊霖）